

茶陵派与“前七子”关系考论

司马周 陈书禄

明弘治、正德年间，以台阁重臣为主的茶陵派和任职郎署的“前七子”相继称雄文坛，他们在明中叶诗文纠偏起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明中叶文坛两个重要的文学流派。这两个流派的主要干将如李东阳、杨一清、李梦阳以及何景明等，互有交往，相互酬唱，甚至还有师生之谊，两个流派的关系也并非在文坛一开始出现就陷入对立冲突的境地，而是呈现逐步恶化的演变历程。探讨两个派别的关系脉络和关系始末，不仅可以清晰考察两个派别交往的轨迹，也可以明晰两个派别关系恶化的演变过程，同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茶陵派与“前七子”在诗文影响和诗话理论继承方面的内在关联。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
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茶陵
派与明中期文坛研究”
(批准号:10YJC751068)
阶段性成果

茶陵派与“前七子”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尤其是茶陵派宗主李东阳与“前七子”领军人物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同为文学大家，又存在师生关系，前后相接的两个文学流派，由鱼水交融到水火纷争，让人颇感不解。本文从茶陵派与“前七子”的往来和关系始末两方面厘清茶陵派与“前七子”的关系，略陈固陋，以就教方家。

一、茶陵派与“前七子”的交往

茶陵派活跃文坛的时间是天顺八年(1464)李东阳考中进士并入选翰林庶吉士到正德七年(1512)李东阳因老病致仕。“前七子”文章复古运动始于弘治中，至正德间而达高潮：“弘、正之间，李东阳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声馆阁。而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诗文，于斯一变。”因此两个流派在文坛的活动时间互有交叉重叠之处，考证这两个流派的交往就尤显必要。下面以茶陵派成员与“前七子”中的李梦阳、何景明两位主将的关系为代表，考证这两个流派在文坛上的往来。

(一)茶陵派与李梦阳交往考

1. 李东阳与李梦阳的交往

李梦阳(1473—1530),字天赐,又字献吉,号空同子。庆阳(今属甘肃)人,后徙河南开封。弘治六年(1493)进士,授户部主事,后迁户部郎中。因反对宦官刘瑾下狱,谨诛,任江西提学副使。后因事革职,居家二十年而卒。有《空同集》六十六卷。就私交而言,李梦阳与李东阳是科举道上的师生关系,然而两人实际交往不多,他们交往事迹大致如下:

第一次交往是弘治六年(1493)二月,李东阳与陆简奉命为会试考试官,取李梦阳为进士。而茶陵派的主将杨一清曾与李梦阳交往甚深,李东阳在《与杨邃庵书》中如此提到:“始得关中书甚悉。朴翁已许谥,足慰輿情,门下之私不足论也。所喻李梦阳者,果得首解,及两张生皆如尊料。时雨之化,殆有不诬。仆所许何生孟春者,输君一筹,然此子之进,尤未可量也。”故李梦阳将李东阳奉为老师。第二次交往是弘治十五年(1502)前后,李东阳应李梦阳之请,为其亡父撰写墓表。其《大明周府封丘王教授赠承德郎户部主事李君墓表》云:“庆阳李君惟中以教授卒于家。吾友都御史杨公应宁为铭以葬,而墓道未表。后君以子梦阳贵,赠承德郎户部主事。梦阳乃请于予,且出其所自为状。梦阳学于杨公,又予礼部所举士,其视予,犹视杨公也。故予虽未识君,亦不得而辞焉。”这清晰地勾画出两人的实际交往,纯粹是因为杨一清的缘故,而李东阳对李梦阳并不熟悉。两人交往仅此而已。再加上当时两人地位悬殊,这一差距也导致隔阂,因此,李梦阳与李东阳凭杨一清之故,虽有师生之谊,但实无深交。

2. 杨一清与李梦阳的交往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杨少师一清》中提到了杨一清与李梦阳的交往关系:“公(杨一清)生而隐官,貌类寺人,才情敏给,汲引士类,海内争趋其门。提学陕西,赏识李献吉,召置门下,故《石淙类稿》属献吉评点行世,而献吉亦亟称公之诗笔与长沙并驾。”这里叙述了两件史事:一是李梦阳曾拜杨一清为师。弘治二年(1489),李梦阳在河南乡试不第,回到庆阳后,就师从杨一清:“愚不佞,少幸从公游。”(《石淙精舍记》)二是杨一清非常赏识李梦阳的才华,他在《读李进士梦阳诗文喜而有作》中如此评价李梦阳的诗歌:“细读诗文三百首,寂寥清庙有遗音。斯文衣钵终归子,前辈风流直到今。剑气横秋霜月冷,珠光浮海夜涛深。聪明我已非前日,此志因君未陆沉。”杨一清读李梦阳诗文时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颌联两句对李梦阳寄予了厚望,认为以后文坛振兴的希望就要依靠李梦阳等人。除了前面所提到的杨一清在李梦阳科考时亲笔写信给李东阳要求关照外,他还将自己的《石淙类稿》一书交给李梦阳评点,杨一清在《与李献吉完副》一文中提及“非献吉似无可托者”,并“余稿数册,烦不吝一二日之劳,概加评跋”,故今可见杨一清诗稿卷首有“门生北地李梦阳评点”字样,李梦阳评点时也对杨一清诗歌大加赞赏,由此可见师生情义。

正是由于杨一清的提携,直接促成了李梦阳“前七子”这一文学流派的形成。谢纯在《杨公一清行状》中指出杨一清为陕西提学副使时:“创建正学书院,拔各学俊秀会业于中,亲为督教,其大规先德行而后文艺。故院中士连魁天下,为状元者二人,其以学行功业著闻者甚多。”其中状元之一就是康海,李梦阳则属于“以学行功业著闻者”。杨一清对李梦阳的影响,还表现在李梦阳所写的《奉寄邃庵相公之作》、《邃庵辞有序》、《奉邃庵先生书十首》等诗文中。

李梦阳与李东阳的交往大多出于客气,浅层交往而已,李梦阳对杨一清的敬重与爱戴则是发自内心的,出于真情,正如其《在狱闻余师杨公诬逮获释踊跃成咏十韵》诗中所称赞的:“先皇亲授钺,报主独褰帷。朔漠威名壮,风霜鬓髮衰……丞史轻周勃,朝廷重子仪……蛟龙没海阔,日月倒江垂。”^⑩在诗歌中,李梦阳高度评价了杨一清的功劳以及对国家所作的贡献,甚至将他与唐朝郭子仪媲美。

3. 茶陵派其他人士与李梦阳的交往

茶陵派其他成员与李梦阳的交往,可参见李梦阳的《朝正倡和诗跋》一文,其文云:“诗倡和莫盛于弘治,盖其时古学渐兴,士彬彬乎盛矣。此一运会也。余时承乏郎署,所与倡和则扬州储静夫、赵叔鸣,无锡钱世恩、陈嘉言、秦国声,太原乔希大,宜兴杭氏兄弟,郴李贽教、何子元,慈溪杨名父,余姚王伯安,济南边庭实。其后又有丹阳殷文济,苏州都玄敬,徐昌谷,信阳何仲默……诸在翰林者,以人众不叙。”^⑫文中李梦阳所言的储静夫(储罐)、乔希大(乔宇)、何子元(何孟春)等都是茶陵诗派的重要成员,而“诸在翰林者”更是以茶陵派人士居多。这段话说明,当时郎署人士,风华正茂,声气相投,唱和诗文,李梦阳这个时期与茶陵派成员的交往非常多,也非常频繁。而且储罐、邵宝等人对李梦阳“前七子”有“开启门户”之功,顾璘《凌溪朱先生墓碑》:“皇朝文尚淳厚,自成化、弘治间,质文始备。翰苑专门,不可一二数;其在台省,初有无锡邵公宝、海陵储公罐等开启门户,自是关西李梦阳、河南何景明、姑苏徐祯卿、维扬则先生,岳立宇内,发愤覃精,力绍正宗,其文刊脱近习,卓然以秦汉为法;其诗上准风雅,下采沈宋,磅礴蕴藉,郁兴一代之体,功亦伟乎!”^⑬

(二)茶陵派与何景明交往考

何景明(1483—1521),字仲默,号大复山人。河南信阳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官至陕西提学副使。性耿介,鄙荣利,不满当时黑暗的政治统治。有《大复集》三十八卷。何景明与李东阳的交往考证如下:

弘治十五年(1502),李东阳充殿试读卷官,何景明举进士。两人形成松散的师生关系。何景明立身能主持正义,宁折不阿,李东阳、杨一清等人对他这种性格还是非常欣赏的。从下列三件事情可知:

一是因李东阳而复官。宦官刘瑾窃权乱政,朝中大臣敢怒不敢言,何景明毅然上书给吏部尚书许进,劝其申张正义,抑制刘瑾弄权,语极激烈。刘瑾得知后趁机报复,革职上告诸官。何景明弃官回乡。正德五年(1510)刘瑾败死,经大学士李东阳提议恢复何景明的中书舍人:“瑾诛,用李东阳荐,起故秩,直内阁制敕房。”^⑭何上任后依然“志操耿介”^⑮。二是上书救李梦阳。正德五年(1510)刘瑾伏诛后,李梦阳再度被起用为江西按察司提学副使。李梦阳在江西做出了许多政绩,同时也树敌不少,“参政吴廷举亦与梦阳有隙,上疏论其侵官,不俟命径去。诏遣大理卿燕忠往鞠,召梦阳,羈广信狱。”^⑯李梦阳入狱后,众臣不敢秉公直言,独何景明上书吏部尚书杨一清,在《上杨邃庵书》一文中,何景明认为李梦阳之所以入狱,就是因为是非曲直,真理正义全部颠倒了^⑰。杨一清对何景明的指责和埋怨不仅没有怀恨和为难,反而救出了李梦阳。三是上书挽留李东阳。正德五年或稍后,何景明闻李东阳以身体不适为由辞官,恰逢这时刘六、刘七等率众起事,分攻山东、河南、河北,所以他去信极力挽留李东阳。在何景明《上李西涯书》中,一方面他批评朝政的荒诞腐败,赞扬李东阳匡扶社稷的功劳:“廷议大缪,市令不行。势急燔溺,独恃明公拯救尔。”另一方面他又不留情面地指责李东阳不该“见祸知畏,睹患思防”,在“责重望深,任利害而当毁誉”之际,“欲以此时保身完名”^⑱,所以其学生乔宁在《何先生传》中评价这件事说:“少师李西涯疏上乞休,会有兵事(何景明)又援古大臣义,为书让之。”^⑲李东阳在这件事上也没有因何景明的指责而怀恨在心,但他最后仍留朝为官,应该说何景明的书信起了一定的作用。

正德七年(1512),李东阳致仕后,何景明还写诗《怀西涯先生》,中有:“六省尚书第一班,两朝元老领千官。空教外国闻裴度,未见东山起谢安。归去朝廷公望重,老来湖海路行难。兵戈此日交驰檄,将帅何时议筑坛!”^⑳对李东阳政绩给予了充分肯定。正德十年(1515)春,乔宗、

何景明还曾去看望致仕后赋闲在家的李东阳,诗酒倡和。同时在李东阳生日的时候,还写有《寿西涯相公》一诗,对李东阳大为称赞:“裴公郭相看前代,社稷苍生望老臣。”^②

何景明与茶陵派其他成员也是常有交往的,经常参与他们的集会。如《何大复集》有《怀麓堂集将游东园以风雨遂止二首》,从中可以窥测何景明曾与李东阳等人有相当的交往。而集中《今昔行送何燕泉》、《四图诗赠何燕泉四首》就反映了何景明与李东阳弟子何孟春私交甚密,尤其是在《今昔行送何燕泉》这首诗中,他高度赞扬了何孟春的杰出文采,同时表明了两人之间的友情。

从何景明与茶陵派宗主李东阳的交往可以看出,李东阳与何景明关系相对李梦阳而言,更为密切一些。而且何景明对于李东阳的荐举之功一直深怀感激,并没有因为隶属“七子”之派而削弱对李东阳的感恩之情,其后来的书信也好,饮酒赠诗也好,无不是因为对李东阳的感激所致,故“前七子”公开攻击李东阳之后,何景明在其文集中几乎没有直接攻击或批驳李东阳及茶陵派的。

二、茶陵派与“前七子”的关系始末

李东阳与“前七子”的关系始末历来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其实从现存文献中可以比较清晰地描绘出两者关系变化的曲线图。

弘治时期,由于明代政治出现了短暂的“中兴”,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文坛也出现了少有的振兴局面,使诗文创作在郎署得到了大范围的普及,一些郎署人士,尽管身在职曹,但公务之余,往往不废文事,以同好宴饮聚会的方式较量文艺,从而在明代文坛开始出现翰林与郎署诗文创作倍出的兴盛场景。对这一现象,不少文人在集子中皆有反映。王廷相《李空同集序》有云:“弘治中,敬皇帝右文上儒,彬彬兴治。于时,君臣恭和,海内熙洽,四夷即叙,兆亩允殖,籍轩无靡及之叹,省寺蔑鞅掌之悲。由是,学士大夫职思靡艰,唯文是娱,不荣跃马之勋,各竞操觚之业,可谓太平有象,千载一时矣。”^③康海《何仲默集序》有云:“弘治时,上兴化重文,士大夫翕然从之,视昔加盛焉。是时仲默为中书舍人,而予以次第为翰林修撰,一时能文之士,凡予所交与者不可胜计。”^④顾璘《关西纪行诗序》有云:“弘治丙辰间,朝廷上下无事,文治蔚兴,二三名公方导率于上,于时若今大宗伯白岩乔公宇,少司徒二泉邵公宝,前少宰柴墟储公瓚(应为罐),中丞虎谷王公云凤,皆翱翔郎署,为士林之领袖。砥砺乎节义,刮磨乎文章,学者师从焉。璘方举进士,得从宴游之末,奉以周旋,窃见诸公契谊,笃厚切切,以艺业相窥,疑无猜嫌,虽古道德之世,无以加也。”^⑤“丙辰”即弘治九年,是弘治中期,正值太平有象、文治蔚兴的时期。

正是由于弘治中期文学局面的繁盛,而李梦阳等人又都是刚入郎署的少壮派人士,故他们跟李东阳门人的关系相当不错,与乔宇、邵宝、储罐、何孟春等人都交往了相当长的时间。李梦阳甚至曾从学于邵宝门下,“追昔从邵公讲道许下,今廿余年矣”(《独对亭铭》)^⑥。邵宝是茶陵派主要成员,因此李梦阳后来复古思想的提出很明显是受到茶陵派诗学理论的影响,在这样一种相对宽松的社会氛围下,“前七子”等人的文学创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为后来执柄文坛奠定了基础。所以黄卓越在研究中认为:“何孟春、乔宇等大批在吏职而兼事诗文之业者,并在后来都成了茶陵派的追随者,对古文词的推阐有积极导率之功。从过后的视角看,这样的风气也影响到了更为年轻的一辈,如李梦阳等前七子成员。”^⑦

“前七子”中的王九思,弘治九年(1496)中进士,在京城文坛的时候一直处于茶陵派的羽

翼之下《列朝诗集小传·王寿州九思》云：“敬夫（即王九思）馆选试《端阳赐扇》诗，效李西涯体，遂得首选，有名史馆中。时人语曰：‘上有三老，下有三讨。’既而，康、李辈出，倡导古学，相与瞽馆阁之体，敬夫舍所学而从之，于是始自貳与长沙矣。”^②此事李开先《溟陵王检讨传》中有更为详细的记载，弘治九年（1514），王九思中第，考选庶吉士，试题为“端阳赐扇诗”，因其答卷中有“谁剪巴江，天风吹落”之句而为李东阳所赏，遂得首选。此后，授翰林检讨，也随列李东阳门下，对其“罔不宗习其体”^③。可知，在弘治十一年李梦阳返京前，王九思对自己的翰苑馆阁身份还是挺中意的，如果没有李梦阳、康海等人的鼓动，他很有可能成为茶陵派的后进骨干。

李梦阳与李东阳门人关系不错的背后，隐藏着他与李东阳关系的冷淡，从两人现有的交往及诗酒酬唱的稀少可佐证。如正德元年（1506）前后，徐祯卿将适湖湘，李梦阳在送给徐祯卿的诗中说：“宣德文体多浑沦，伟哉东里廊庙珍。我师崛起杨与李，力挽一发回千钧。”（《徐子将适湖湘余实恋恋难别走笔长句述一代文人之盛兼寓祝望焉耳》）^④不少学者在研究这首诗时，都认为此诗表现了李梦阳对李东阳的尊敬。从表面上看，李梦阳这两联诗既有对杨士奇为首台阁体成就的承认与肯定，也有对李东阳所领导茶陵派诗风的推崇与钦慕，同时高度赞扬了杨一清与李东阳在扭转台阁体文风方面所做出的不朽贡献。似乎李梦阳是在称颂杨一清与李东阳，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目的并非如此，正如钱谦益所言，因为当时李东阳为一代文坛宗匠，李梦阳并举杨一清、李东阳，目的是不愿让李东阳独霸文坛，“轩杨正所以轻李也”^⑤。

李梦阳与李东阳关系淡漠，甚至可以说李梦阳并没有将李东阳的文学成就放在眼里，《明史·李梦阳传》说：“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⑥故不久，即正德元年六月，李东阳六十大寿，李梦阳赋长句赠之，在《少傅西涯相公六十寿诗三十八韵》赞美李东阳：“文章班马则，道术孟颜醇……绝艺邕斯上，高情籀籀邻。一挥惊霹雳，只字破风尘。绚烂王侯宅，苍茫海岳滨。”^⑦这首诗中，李梦阳就用大量篇幅议论李东阳的书法、功业及文章，而对李东阳的文学成就只字未提。对此，陈田认为：“专颂扬其书法，轩轻已见微意。”^⑧应该说，一开始李东阳、杨一清等人对李梦阳、何景明等“七子”并无排斥之意，甚至对他们年纪轻轻就才华横溢还非常称赏，如《对山文集》所附《诸家评语》中有相关记载：“杨邃庵曰：‘吾于秦中得李献吉，诗不愧李杜，得康德涵，文不愧马班。’西涯公称善。”^⑨在这里，杨一清高度赞赏了李梦阳和康海，将他们与李杜、马班相比，而李东阳所持看法与杨一清一致。

李东阳与李梦阳的龃龉，从有关资料看，是源于“康海事件”。康海是弘治十五年的状元，曾深得孝宗赏识。据张治道《翰林院修撰对山康先生状》记载：“是时李西涯为中台，以文衡自任，而一时为文者皆出其门。每一诗文出，罔不模效窃仿，以为前无古人。先生独不之仿，乃与鄢杜王敬夫、北郡李献吉、信阳何仲默、吴下徐昌谷为文社，讨论文艺，诵说先王。西涯闻之，益大衔之……无何，丁母忧，归关中。往时京官值亲歿时，持厚币求内阁志铭以为荣，而先生独不求内阁文，自为状，而以鄢杜王敬夫为志铭，北郡李献吉为墓表，皋兰段德光为传，一时文出，见者无不惊叹，以为汉文复作，可以洗近文之陋矣！西涯见之，益大衔之，因呼为‘子字股’，盖以数公为文称子故也。若尔，非大衔也。”^⑩李开先《闲居集》卷一〇《对山康修撰传》、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一五、李贽《续藏书》卷二六《修撰康公》有类似记载。

从这段话的记叙可知，一是康海进入翰林院后不久，便与李梦阳等人“为文社，讨论文艺，诵说先王”，独不仿效李东阳的诗文风格，李东阳大为恼怒；二是康海母亲去世，按照当时惯例和风尚，士大夫有父母之丧，应“持厚币求内阁志铭”，康海自己作“行状”，请王九思为“墓志铭”，段德光为“传记”，清正被逮至京师的李梦阳作“墓表”，这让当时“方秉海内文柄”的李东阳等人感觉很没面子，非常生气，因此更为忌恨康海等人，直呼康海之文为“子字股”。在“七子”中，康海

与李东阳的矛盾表现得最为激烈,康海反对李东阳的态度也是最为坚决和彻底的。

嘉靖六年(1527)李梦阳所作的《凌溪先生墓志铭》就标志着李梦阳等“前七子”与李东阳关系的彻底断裂。此时,距李东阳逝世已有十一年,李东阳也因自身台阁的身份将政治与文学上的短处暴露无遗。政治上,在刘瑾擅权时期,李东阳“随事应变……解纾调济,潜消默夺,天下阴受其赐”(杨一清《李公东阳墓志铭》)^⑨,但其所作仍被人所耻,认为他“处刘瑾、张永之际,不可言臣节矣”^⑩;文学上,囿于台阁侍臣的心态,在反台阁体方面并不彻底,诗文作品中时有典雅流丽、平正雍容之作,其末流更是“如衰周弱鲁,力不足以御强横”^⑪,故也被李梦阳等人所轻视。

李梦阳为朱应登所写《凌溪先生墓志铭》中愤然指出:“(朱应登)年二十,举进士。时顾华玉璘、刘元瑞麟、徐昌谷祯卿,号‘江东三才’。凌溪(朱应登)乃与并奋,竞聘吴楚之间,歛为俊国。一时笃古之士争慕响臻,乐与之交,而执政者顾之不喜,恶抑之……而柄文者承弊袭常,方工雕浮靡丽之词,取媚时眼,见凌溪等古文词,愈恶抑之曰:‘是卖平天冠者’。于是,凡号称文学士,率不获列于清衔。”^⑫朱应登,是以李、何为核心的“十才子”之一。陈田《明诗纪事》中指出:“柄文者,谓茶陵(即李东阳)也。”^⑬正因为李东阳去世有年,李梦阳所领导的“前七子”已逐渐在文坛形成气候,故文中,李梦阳非常尖锐地批评李东阳在创作中“承弊袭常,工雕浮靡丽之词,取媚时眼”的缺点。这篇文章可以看作“前七子”为他们与李东阳的关系划上了一个句号。并且在李东阳去世后,“七子”之一的王九思所创作的杂剧《杜子美游春》,就是影射李东阳,发泄愤懑,李梦阳也是余恨未已,在《凌溪先生墓志铭》中借题发挥,大肆攻击和指责李东阳,此时,双方之间的师生情谊荡然无存。

“前七子”与茶陵派交恶的原因有二:

(一)李梦阳性格使然。“梦阳素有才名,然刚愎险薄,好与人争”^⑭。李梦阳被捕入狱后,何景明曾为李梦阳的事上书杨一清,其在《上杨邃庵书》中提到李梦阳的弱点就是“自崇而弗下人,太任而弗识时,多愤激之气,乏兼容之量”^⑮,与人争,便依理直行,见恶必击,嫉恶如仇,故树敌不少,攻讦非难亦起。李梦阳性格很容易走极端,像后来对待自己派内志同道合者何景明亦是如此,对于何景明的议论一驳再驳,直到何景明不再争辩才停止。

(二)流派纷争的需要。“前七子”要想在文坛立足,树立自己的流派权威,就必须对以往流派开火,直到另一流派的文坛影响完全销声匿迹。正如郭绍虞所评价的:“什么是明代文学批评的特征?那是颇带一些‘法西斯式’作风的。偏胜,走极端,自以为是,不容异己。因此,盲从、无思想、随声附和、空疏不学,成为必然的结果。这是法西斯式作风所应有的现象。”^⑯“在这种流派互争的风气之下,当然其批评态度需要一种泼辣辣的霸气。钱谦益《赠别胡静夫序》中说:‘今之称诗者掉鞅曲踊,号呼叫嚣,丹铅横飞,旗纛竿立,牢笼当世,诋调古学,磨牙凿凶,莫敢忤视。譬诸狂易之人中风疾走,眼见神鬼,口吞水火,有物冯之,懵不自知。已而晨朝引镜,清晓卷书,黎丘之鬼销亡,演若之头具显,试令旋目思之,有不哑然失笑乎?’”(《有学集》卷二二)由当时诗坛批评的霸气言,真有‘磨牙凿凶,莫敢忤视’的情形,所谓泼辣到极点了,也可谓狂易到极点了。本来,凡是带一些法西斯式作风的,差不多都近狂易的态度。”^⑰

总之,茶陵派与“前七子”最初关系不错,诗人之间往来也比较频繁,两个诗歌流派最终走向分裂,乃至对立。两派交往错综复杂,弄清楚茶陵派与“前七子”的交往关系及两个流派关系的始末,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茶陵派与“前七子”在诗文理论与诗文创作上交互影响之关系。

① 有关茶陵派活动时间的详细考证,参见拙作《李东阳与明中期文坛》,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

- ②⑭⑮⑯⑰ 《明史》,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307页,第7349页,第7350页,第7347页,第7348页。
- ③④⑸ 《李东阳集》,岳麓书社1985年版,卷二第213页,卷三第230页,第457页。
- ⑤⑦⑸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57页,第314页,第257页。
- ⑥⑪⑫⑮⑲⑳ 李梦阳:《空同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262册第452页,第238页,第543—544页,第549页,第155页,第238页。
- ⑦⑨ 杨一清:《石淙诗稿》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1997年版,集部第40册第411页,第373页。
- ⑧ 《杨一清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100—1101页。
- ⑩ 焦竑:《国朝献征录》,《明代传记丛刊》,台湾明文书局1991年版,第109册第523页。
- ⑬⑳ 朱应登:《凌溪先生集》卷一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第51册第497页,第495页。
- ⑰⑱⑲⑳㉑㉒ 何景明:《何大复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65—567页,第567—568页,第668页,第441页,第456页,第566页。
- ㉒ 《王廷相集》卷二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23页。
- ㉓㉔ 康海:《对山文集》,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年版,第205—206页,第32页。
- ㉕ 顾璘:《顾华玉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63册第458页。
- ㉖ 黄卓越:《“前七子”之前与同时的文章复古意识》,载《清华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 ㉗ 《李开先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98页。
- ㉘㉙ 陈田:《明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6页,第1136页。
- ㉚ 黄宗羲:《明文海》卷四三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58册第224页。
- ㉛ 焦竑:《玉堂丛语》卷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页。
- ㉜ 永瑆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〇,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90页。
- ㉝ 《明实录·明武宗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6年版,第2282页。
- ㉞㉟ 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13页,第514页。

(作者单位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山木